

一 革命运动兴起与清末 “预备立宪”

1. 近代西方宪政学说在中国的 传播

宪政，即宪法政治，也就是民主的政治。它是一种以制定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与封建专制制度截然不同。从广泛的世界历史角度看，宪政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早在 17 世纪后半期，英国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的斗争和妥协中，先后通过或确认了一些法令、惯例，逐渐形成了宪法体系，建立了君主立宪政权。到了 18 世纪，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同样把制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加以确定，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权。这些国家所颁布

的宪法，大都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为理论基础，对国家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作了全面的规定，宣布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是“天赋人权”；言论、信仰、著述和出版自由；确认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原则，具有十分明显的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色彩。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争取制定宪法、实现民主政治的运动开始于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先进的中国人在抵抗外来侵略的同时，便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寻找救国道路的艰辛曲折历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学说也因此而逐渐地被介绍到中国并传播开来。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犹如一声霹雳，震惊了处于昏睡状态的大清帝国。在经历了“坚船利炮”与大刀长矛的较量之后，清朝帝国的尊严被无情地戳破了，长期关闭的“天国”大门被轰开了。自此，广阔的中华大地成了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封建的中国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中。

国门洞开，使中国的思想界受到前所未有的

的大震动。许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从过去埋头于训诂、考证的故纸堆中站了起来，一部分封建官员缙绅也逐渐从过去夜郎自大、墨守陈规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看到了古老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在各方面的差距。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先进的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对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反应，也预示了被迫“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在鸦片战争期间及其后，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相为杰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先后编译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关于外部世界的书籍。书中不仅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物产、习惯和风土人情，而且对西方各国的政事也做了介绍和评价。虽然由于时代、阶级和认识的局限，它们对西方政制的理解还很浅显，所掌握的情况有些仅是传闻，而且主要强调学习以坚船利炮为中心的西方物质文明，强调用西方的“长技”来抵御外来侵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意向。但是，他们探求新知的进取精神，确为中国人学习西方开了先河。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正是从他们开始的。

近代西方民主宪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到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当时，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资本主义随着洋务民用工业的举办而产生，因此出现了反映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维新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与林则徐、魏源等人相比，他们开眼看世界的视角更为广大。除了以西书为媒介了解世界以外，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还与来华的洋学士朝夕相处，切磋知识。也有些人则亲历西方，足践欧土。因此，对于世界大势和中国所面临的危境的认识，他们相应也就深刻些。这些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以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比较和分析，他们普遍感到，西方的议院制度的确有种种优点，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国家富强。所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转贫为富，必须首先在这方面效法泰西，进行改革。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应该加以改革。他赞赏英国和德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权力偏于上，而民主共和的国家权力偏于下，实行君主立宪政

治的国家权力得其平。因此，他认为君主立宪政体适合中国的国情。另一个早期维新思想代表人物陈炽也持此主张。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类。他认为，前两类国家均有弊端，只有君民共主最好。陈炽十分赞美西方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并把能否设立君主立宪的议院看成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此外，早期维新思想家还对封建顽固派的守旧思想和洋务派学西方只知抄袭皮毛的做法都进行了批评。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张也有明显的弱点和局限性，比较突出的集中在他们不敢攻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学说的介绍和引进缺乏系统性，还没有把进化论、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系统地介绍给国人。这表明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但是，尽管如此，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传播，在当时不仅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并且为后来的戊戌维新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世纪末叶，伴随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面临的危机更加严重了。尤其是经过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于是，在战后，各国列强纷纷在华开办厂矿，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处处扼咽喉，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这两句诗，形象地说明了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重。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获得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成长起来。民族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迫切要求改革现状。于是，在此形势下，近代西方民主宪政学说在中国传播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爱国救亡的政治声浪也迅速地把早期维新思想推进到更高的层次，从而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社会思潮，并转变成一场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就是戊戌变法或称戊戌维新运动。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说，中国的宪政运动是以戊戌维新运动为开端的。

站在维新变法最前列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康有为被奉为旗手。他们从指导变法救亡政治运动的愿望出发，大力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尤其是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各种思想和理论加以吸收。他们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向西方学习的原则，即“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号召人们大量译介欧美与日本政治、文学之书。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一时间人文社会科

学界的翻译事业兴旺发达，成果卓然。像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代议政治论》，以及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等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经典著作与文献，都被译成了中文，撒向社会，为维新志士的政治变革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这一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还创办一批近代报刊、新式学堂以及一些学会，大造变法的社会舆论，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他们还针对封建顽固派以及洋务派反对维新变法的观点进行有力的抨击，指出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贫弱的根源，变法是“天下之公理”，不变法国家将会灭亡。要求兴民权、设议院，改行君主立宪。他们的主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震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使谈时务和学西学形成社会风气。据记载，当时“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

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等人把他们向西方学习的一整套主张付诸社会实践，敦请清政府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在他们不断上书请求下，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等人的主张，于 1898 年 6 月 11 日下诏宣布变法。在短短的 103 天

里，一系列变法诏书陆续颁布，内容涉及废除某些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两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改良政治的要求。

但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竭力反对。加之康有为等人既缺乏群众基础，又没有军事力量，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不掌实权的皇帝身上，因而与顽固派稍加对抗，便败下阵来，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

戊戌变法在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改革，所要求的是改革整个社会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西方式的近代国家，因此是一次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政治运动。它的失败，也证明用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方法来实现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理想，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尽管在西方，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不同形式，但中国是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排除了用君主立宪的形式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可能。但曾是戊戌变法旗手和主将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却未能从血的教训中认识这一点。此后，他们死抱着君主立宪方案不放，反对民主共和国，堕落为保皇派，成了时代的落伍者。相反，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则

顺应时代潮流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2. 资产阶级革命派初试锋芒

20 世纪初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

资产阶级革命，还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年就已经开始。最早投身于革命运动并逐渐被国内革命志士公认为是这场革命领袖的人物则是孙中山。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办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纲领，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开端。

从建立兴中会开始，孙中山就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先后于 1895 年和 1900 年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虽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两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武装反清的第一枪，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用孙中山的话说即“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进入 20 世纪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

化；二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他们在政治上日益活跃起来，并很快在日本东京和中国上海形成了两个革命活动中心。两地志士互通声气，协同行动，使得革命形势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当时，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以赴日本为最多，19世纪末不过一二百人，但到1903年就达到了1300余人。1905年到1906年间，又激增至8000多人。这批海外学子接触了新知识新思想，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忧时感愤，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孙中山十分重视对留日学生的联络工作，积极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热情赞助他们办刊物鼓吹革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大批留学生投到革命派旗帜下。

1900年，留日学生在东京建立起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部分会员创办《译书汇编》，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著名人物如卢梭、孟德斯鸠、约翰·穆勒及斯宾塞等人的作品，宣传民主思想。次年5月，励志会会员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国民报》，这是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而独具特色，还明确地同康有为等保皇党人划清政治界限。1902年冬，鉴于

励志会内部严重分化并已解体，爱国志士秦毓鎏、叶澜等另组团体——中国青年会，规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这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小团体。在此前后，留日学生还组织了“清国留学生会馆”、“共爱会”等小团体，逐步开展政治活动，把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与此同时，国内知识分子队伍也在不断壮大。1901年后，各地新建学堂陆续增多，各种各类学堂达到4.24多万所，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这些学堂培养出了一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难加深和群众运动高涨的形势下，掀起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并且很快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上海是国内学界开展活动的中心。1902年4月，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以各种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这是国内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爱国团体。不久，蔡元培又组织成立爱国学社。在此影响下，各地教育会、教育研究所之类的组织也应运而生。革命志士们高谈革命，反对专制、奴化和迫害，倡言自由与平等，政治倾向日趋激烈，竞相开展爱国活动。

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和国内的“学界风

潮”是中国资产革命派在政治上崛起的重要表现，这一新型知识阶层一投入社会斗争，就以其特有的觉悟性，把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推向前进。1903年出现的拒法运动和拒俄运动，就是新型知识阶层展示自己爱国民主力量的具体体现。这些爱国斗争推动着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使更多的人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对于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潮流，清政府企图以暴力进行阻遏，但其结果却使革命潮流更加汹涌澎湃。1903年发生的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就是明证。（苏报）1896年创办于上海。戊戌变法后，由落职知县湖南人陈范接办。1902年开辟“学校风潮栏”，开始宣传革命，约章士钊、章太炎、蔡元培为其撰文，以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最为激烈，鞭挞了清朝二百多年的封建专制，号召以革命打倒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清政府对此老羞成怒，便照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了《苏报》，章太炎、邹容及报馆有关人员被捕入狱。此事使全国人民更加痛恨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革命派的影响也从此更加风靡全国。

这一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崛起，民主革命思潮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许多革命

宣传家奋笔疾书，奔走呼号，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其中以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最为有名。1903年5月，邹容出版了他的《革命军》一书，该书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尖锐抨击清政府，热情赞扬革命，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在邹容心目中，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应该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为榜样。他说：“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而定。”他称赞法国卢梭的《民约论》，认为卢梭的学说是起死回生的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完全可以根治中国社会的顽固症。在全书的最后，邹容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由于这本小书系统地阐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 and 主张，加以文笔浅近、犀利，说理明澈，情感丰富，因而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以先睹为快。几乎与此同时，湖南人陈天华怀着对清政府的满腔义愤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已迫在眉睫，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号召人们起来排满，杀洋鬼子，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这两部书以通俗易懂见

长，充满炽热的爱国之情，在各地广为流传，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章太炎当时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宣传家，他的书文政论性极强，具有“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魅力和作用，尤其是在 1903 年写就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深受民众欢迎。他痛斥康有为所谓“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歌颂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宣传民主与“合众共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号召人民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崛起与发展，客观上要求他们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以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随着革命思潮的不断传播和进步留学生纷纷回国，从 1903 年末到 1904 年，国内一批新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先后建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和江浙的光复会。这些小团体频繁活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打击清政府的统治，对于后来国内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由于这些小团体大都是分散性、区域性的团体，活动范围狭小，又没有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因而在斗争实践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有鉴于此，1905 年初，孙中山开始着手筹建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工作，几经努

力，同年 8 月 20 日，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章太炎、宋教仁、陈大华等被选为各个机构的负责人。至此，全国主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团体“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下，实现了大联合。

一场埋葬清王朝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3. 立宪派的出现与清廷宣布 “预备立宪”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实际上活跃着两个派别的力量，一是革命派，一是立宪派。它们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从大的方面讲，这两个派别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富强而努力。但是，这两个派别毕竟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因而在如何实现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革命派强调以革命方式摧毁清政府，革除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于中国。相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

益的立宪派则对清政府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及自觉性做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对专制统治的顽固性和腐朽性认识不足，指望在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前提下，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政体。相形之下，立宪派的主张是幼稚而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他们的努力和探索不可能结出希望的硕果。

立宪派的出现与 20 世纪初瞬息万变、复杂的国内形势密切相关。

1901 年，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实行“新政”，并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主持“新政”的机关。她之所以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也没有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意思，只不过是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形势下，为缓和对内对外的紧张关系而改换的一种统治方式而已。但若干“新政”，如奖赏实业、废科举、兴学堂，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某些促进作用。清政府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特别是由于“新政”的一些内容也包含着戊戌变法志士们所追求的事业，因此，社会上一些人，主要是原来倡导维新变法的改良派，相继发出了立宪的呼声，并由此逐渐扩大为颇有声势的立宪运动。

在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君主

立宪制的日本打败了君主专制的沙俄，这一结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一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成为多数人的看法。改良派更是从这一结果中受到鼓舞，更坚定了他们对立宪的追求。他们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强调立宪致强，专制必亡，要求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一些原先的洋务派成员，开明的满族亲贵和汉族大臣以及驻外公使等出于维护清政府统治的考虑和对“内忧外患”时局的认识，也倡行立宪，认为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望”。这些位高权重人中的个别者甚至还和一些改良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相互鼓吹立宪。于是，在此情形下，要求立宪的呼声更显广泛，犹如当时报纸所形容的：“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俨然成了一股令人注目的气势。

从主张、要求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上看，立宪派实际上是 19 世纪维新派的继续与发展。它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由改良派转化过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二是 20 世纪初年逐步成长起来的亦官亦商的资产阶级实业家和